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1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urth Edition)

跨

与陌生人交际

——跨文化交流方法

(第四版)

William B. Gudykunst Young Yun Kim 著

Mc
Graw
Hill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与陌生人交际——跨文化交流方法 (第四版)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urth Edition)

■ William B. Gudykunst Young Yun Kim ⊙ 著

Steve Kulich 尹国梁 李安娣 ⊙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陌生人交际: 跨文化交流方法 / (美) 威廉 (William, B. G.) 著;
(美) 金洋咏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ISBN 978-7-5446-0294-5

I. 与… II. ①威…②金… III. 文化交流—高等学校—教材
IV. 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16644号

图字: 09-2005-106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in 2003.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and sold elsewhere.

本书由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包 洁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2.5 字数 750千字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46-0294-5 / H • 0132

定 价: 5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编委会

主任: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副主任:

Bates Hoffer (美国三一大学)

Nobuyki Honna (日本青山大学)

Steve Kulich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 凌 (香港浸会大学)

高一虹 (北京大学)

委员 (以姓氏笔划排序):

Andy Kirkpatrick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Michael Prosser (上海外国语大学)

Robert N. St. Clair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陈国明 (美国罗得岛大学)

顾嘉祖 (南京师范大学)

罗选民 (清华大学)

申惠中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许力生 (浙江大学)

张惠晶 (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庄恩平 (上海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总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 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中的差异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动态多变的过程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中去。以此为基点, William B. Gudykunst 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期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 曾在其著作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一书中总结了15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在21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至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

视,在“文化热”和“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上世纪8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和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6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2000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视角独特的观点。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和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期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20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liam B. Gudykunst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

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年4月

作者简介

William B. Gudykunst

William B. Gudykunst (1947—2005) 是跨文化交际领域罕有的多产学者之一, 在他短短57年的生命历程中为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Gudykunst 于2005年1月去世, 时任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的语言交际学教授。

在2000年交际学调查报告评选中, Gudykunst 名列当时活跃在交际学领域中最多产学者的第四位。他所创作(包括参与创作)或编辑(包括参与编辑)的书及专著超过28本, 并有200多篇文章及论文出现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在国际交际协会、跨文化心理学国际协会等多个国际组织举办的国内及国际会议上, Gudykunst发表了90多篇高质量的论文。

在过去的24年中, Gudykunst 参加了13个编辑董事会, 并为7种期刊及《交际学年刊》(2000—2002年第22、23、24期)做过责任编辑、特稿编辑及合作编辑。其中, 他最主要的贡献是为《国际及跨文化交际年刊》(1983—1985年第7、8、9期)做终身编辑。他与同行一起, 将年刊办得非常全面, 使其成为各大课题(跨文化研究方法、跨文化理论和人际交际)研究的基准。

Gudykunst 最受欢迎并被广泛参阅的著作包括《跨越差别——有效的群体内交际》(1991年, 2003年第四版)、《文化与人际交往》(与 Stella Ting-Toomey 合作, 1988年)以及《国际及跨文化交际年刊》。不过, 广为大家研究的却是《与陌生人交际》。本书现已第四次出版, 被世界各地选为本科高年级及研究生教材。即使在 Gudykunst 本人身体欠佳时, 他仍坚持对他早期作品《国际及跨文化交际手册》(1994年最初与 Molefi Asante 合作编写, 2001年与 Bella Mody 合作再版)进行全面的修订, 同时还承担了专门针对高级水平研究者的教材《跨文化交际》(2003年)的编辑工作。此外, 他对早期《建立跨文化交际理论》丛书中的理论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

Gudykunst 因其学术成就屡获殊荣:《与陌生人交际》曾在1984年被“言语传播协会”(现名 NCA)评为最佳书刊;《文化与人际交往》(与 Stella Ting-Toomey 合作)则在1988年被国际交际协会的跨文化发展与交际分部评为最佳书刊。1998年, Gudykunst 协助组织并主持为筹备国际跨文化研究学会(IAIR)在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召开的策划会议。该学会是一个致力于引领跨文化研究的国际性跨学科组织, Gudykunst 也因而成为该组织“创始会员”。同年, Gudykunst 又成为国际传播协会(ICA)的“特别会员”, 并于2002年被该组织的跨文化发展分部授予“终身成就奖”。

Gudykunst 主要侧重于对人际交往以及群体交际效力的理论研究, 并利用这些原理来提高交际水平。他是跨文化交际理论、个人和人际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方面的先导, 曾经协助出版了三册关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书, 在跨文化领域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 他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焦虑及不确定性理论(AUM)的文章。

Young Yun Kim (金洋咏)

Young Yun Kim (金洋咏), 跨文化交际协会会员, 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系教授, 其教学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跨国交际、跨文化交际以及种族间交际。金教授在核心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逾60篇。她曾是其中7家核心学术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撰写编辑了11本重要的跨文化领域书籍, 其中包括《民族间交际》(Sage, 1986) 以及《跨文化交际理论》(与Gudykunst合编, Sage, 1986)。金教授组织过多次主题研讨会和座谈会, 在众多交际与跨文化协会中起到了领率作用。她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论文逾百篇, 其中有12篇被评为“最佳论文”。她在学术会议及大学座谈会中发表主题演讲25场, 在美国社区及组织发表公众客座演讲50多场。

金教授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70年到美国, 在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资助下获得了夏威夷大学授予的言语传播学硕士学位, 1976年又在伊利诺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之后, 她执教于伊利诺州的西部州长办大学, 1988年转到俄克拉荷马大学, 协助开发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项目。

金教授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调查研究始于博士论文撰写期间。她不遗余力地对美国的移民群体、难民群体以及少数民族进行原始研究, 这些研究为金教授第一本有关跨文化适应的著作——《交际与跨文化适应: 整合理论》(1988) 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在另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成为跨文化人: 交际及跨文化适应整合理论》(2001) 中, 金教授进一步阐明了她的跨文化适应理论。近几年来, 金教授拓宽了研究领域, 把种族/族群、种族身份和种族间交际也纳入研究范围, 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系统深入地对种族间交际的不同形式进行理论化梳理。

金教授对该领域的浓厚兴趣与她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从初涉美国社会努力适应环境, 到融合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从此不再是陌生人。她通过自己与Gudykunst教授的独到见解和丰富经历, 引导人们如何行之有效地完成这一跨文化过程。

鉴于金教授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 尤其是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成就, 她在2002年成为跨文化交际协会会员。金教授的非凡成就也使她在2006年德国德雷斯顿国际传播协会(ICA)大会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殊荣。

本书介绍与回顾

本书第一版于1984年首次出版时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尽管此前已经有几本跨文化方面的教材先后出版,如《跨文化读本》(*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Larry Samovar & Richard Porter, 1972)、《跨文化交际介绍》(*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John Condon & Yousef Fathi, 1975)和《文化对话》(*The Cultural Dialogue*, Michael Prosser, 1978),不过William B. Gudykunst和Young Yun Kim合著的《与陌生人交际》更好地把跨文化交际界定为一门广泛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学科。本书整合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过程和现有的理论,试图为刚入门的学生及感兴趣的学者提供学术上的介绍、重要理论的综述以及跨文化交际在人际交流上的应用。

凡此种种优点令本书于1986年11月荣获由美国传播协会(当时名为言语传播协会)国际与跨文化交流司和跨文化交际协会跨文化发展交流司颁发的杰出作品奖。据William B. Hart引用分析(1999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上发表23, 4, 575—589),本书自1997年首版以来在IJIR上最常引用的书目中名列第九,新版的广泛使用(包括外文版)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影响力。

根据美国出版公司McGraw-Hill的销售统计,本书是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阶段跨文化交际课程的主要课本,在欧洲(如挪威、德国、荷兰、英国、葡萄牙)、亚洲(日本、印度、新加坡)、中南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牙买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世界各国广泛使用。

本书首先考察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过程,然后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从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交流模式的人们中间实现相互理解,这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尤为重要,但本书对理论的应用却是超越种族差异的。随着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跨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本书紧跟潮流,及时吐故纳新。第三版(1997年)作了较大的扩展,从而可以全面涵盖核心的概念和观点;第四版(2003年)在学术上更扎实,覆盖面更广,更多地关注全球问题。

在最近研究的基础上,本版本扩展了覆盖面,涵盖了异族约会(interethnic dating)、群体内部偏见(ingroup biases)、种族身份(ethnic identities)、带偏见的交际(prejudiced communication)、面子和面子功夫(face and face work)、冲突中的文化和种族差异(cultur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conflict)及改变对陌生人行行为的预期(changing expectations for strangers' behaviors)。

本书融合了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理论,如第四章的更新的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和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理论,第五章的显性和隐性偏见(overt and covert prejudice)理论,第八章的会话约束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 theory)和交际顺应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第十一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等等。

本书的结构遵循以下前提:为了理解跨文化交际(即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必要首先理解文化间的差异(即文化间的交际如何有差异)。本书作者还揭示

了跨文化交际和群体间交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交际过程在两种交际类型中——从“陌生人”到建立共同基础并发展关系的过程——是如何取得一致的。这个过程有文化的、社会文化的、心理的和环境的影响，本书将就这些影响分别在每章中予以讨论。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它花了更多的篇幅和细节讨论语境、文化身份、跨文化交往中伴随的心理现象，如刻板印象（stereotype）、偏见（prejudice）、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等；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着眼于交际的方式，还强调这些方式如何影响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像如何解读言语和非言语意义）。

本书在最后大胆地将理论融入实践，提出了适应“陌生人”而进行调节的方法，相关章节探讨了交际技巧、冲突管理、维护面子和自尊、发展关系、发展文化适应能力、克服死板的文化地方主义并在他我关系中成长为跨文化人的过程，以及通过着重认识种族观点、文化相对论、文化普遍论等来培养社群意识的种种途径。最后，我们遇到的陌生人，经过观察、交往、欣赏和融合，结果就不再称其为陌生了。当我们完成本书的阅读之时，本书已经帮助我们架起理解之桥。

导论

第一部分 基本概念

第一章 概论

在第一章，两位作者给出了一个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他们认为，在 Marshall McLuhan 所描述的“地球村”，全球通讯网络越来越发达，文化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跨文化这一领域的出现是很有必要的。在大量参考 Edward Hall 早期理论的基础上，本书作者讨论了交际与文化间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如何影响文化的异同以及我们对此的反应。他们也吸收了 Paul Watzlawick 等互动论者的研究以及他们的“交际公理”理论：

1. 我们必须要有交际
2. 任何信息都可以从内容和关系两个层次来解释
3. 关系的本质视交际双方交际顺序的间断而定
4. 交际是动态的、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
5. 交际是符号性的
6. 意义包含在符号中，从符号中得到解释
7. 每一个人类群体都赋予每一个符号一个独特的意思
8. 有些信息的传递是无意识的

在这套理论中，作者又融入了 Berlo、Fisher 等传播学者的成果。Berlo 认为交际是信息传递与解释的复杂的动态过程；Fisher 的观点是：交际中传递的信息对所有的交际者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是残缺不全的。本书也参考了 Beck 对于我们在构建（或曲解）意义时所面临的种种局限的研究，以及 Abelson、Berger 等所研究的人类意识（隐性或显性）的各个层面。本书还探讨了 Miller 和 Steinberg 就可预测性如何影响交际的研究，Traandis 对意向性、习惯、情感和习得脚本（learned script）的进一步研究亦有所涉及。

第一章集各家之言，给出 8 个命题。这 8 个命题也可以简化为本书 12 页列出的交际的 6 个关键特征：

1. 交际是一项符号性活动
2. 交际是一个过程
3. 交际包括信息的传递与解释
4. 交际包括意义的创造
5. 交际发生在知觉意识的各个层面
6. 交际的发生无须依赖于意图

读者也许会发现，Samovar 和 Porter 在《文化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这本入门读物的第一章和其他文本中，也列出了类似的交际特点和命题。

汇集众传播学者的共同观点，作者提出了 Gudykunst 对不确定性和焦虑感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他的概念来源于 Charles Berger 早期就不确定性的研究，并融合了

Stephan 和 Stephan 对焦虑感的研究,形成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AUM)的完整理论。Gudykunst 著作的一大优点在于他比其他跨文化学者应用了更多的心理学。伍晓慧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汉语的跨文化交际的课本中,情感或者情绪的心理领域往往只占几页篇幅,并且仅仅局限于一些比较笼统的话题,如观念、偏见或文化冲击的感受。但是 Gudykunst 在本书以及他的《跨越分歧》一书中始终围绕交际中的情感影响这个核心。通过结合情绪的心理分析、认知及行为(完善了由 Clyde Kluckhohn 等人提出的经典三角关系),他和 Kim 为揭开跨文化研究中的情感谜团提供了一种非常现实的研究方法。

本章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文化做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Olson 关于个人、社会和文化排序的观点被用来解释社会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并使集体生活秩序井然且富有意义。从 Krober 和 Kluckhohn 及其他人曾经提到过的数百条定义中,作者选取了 Kessing 的文化定义,因为它融合了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见 15 页)。这个定义探讨了文化和我们的社会化是如何通过规则、规范影响我们,从而帮助我们发展交际理论,并指导我们的交际行为。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化、情境和我们个体的性格如何影响自我,本书作者提供了一个图表模式(见 17 页)。“文化”这个词特指社会排序的社会层面,而不仅仅是指民族界限或身份。

两位作者还解释了某些相关的术语:“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对意义归因的互动的、象征性的过程”;“文化内部交际”(i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cross-cultural 则被定义为“文化间某些现象的比较”。

了解本章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学习重要理论、相关概念、过程和技巧的重要性。这样,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或需要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交流时,种种交际挑战便会迎刃而解。

第二章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

在本章,两位作者提出了很独特的研究方法。他们将跨文化交际看作是陌生人进行的群体间的过程、减少不确定性的个人过程以及为了有效交际而留意他人的过程。

Gudykunst 和 Kim 认为,跨文化交际可以通过用于描述其他交际方式的相同基本变量和过程来理解。任何交际都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他们对对方了解的程度各异。在这种情境下,对他们来说,陌生人的概念是了解跨文化交际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对 Georg Simmel 研究成果的应用。

在同陌生人交际时,陌生与熟悉构成了一个感知的连续体。本书作者使用“陌生人”这一术语来代指那些处于该连续体中最生疏的那一端的人。因此,处于极其陌生的情境中,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陌生人。陌生人对其所处的新环境(它的规范和价值观)所知甚少,而当地人对该陌生人(其信仰、兴趣和习惯)亦是如此。一般说来,与另一方交际,有必要预测或预料对方的反应。与熟人交际时,我们对自己的预期很有把握,并且还有可能全然不知我们作了预期。相反,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会容易察觉到他们可能做出的种种反应以及我们预期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交际预测是建立在各层次的数据基础上的。第一层是文化层次,涉及到另

一方的文化信息以及该文化中占主流的价值观和规范。这经常是在与陌生人交往时可得到的唯一一层信息。第二层次的信息是社会文化性的，包括有关对方群体成员或者他们竭力认同的群体的数据。这种信息在多情境的本文化交际中占主导地位。然后便是心理文化数据，这类数据与个体特征，特别是与朋友或较亲密的人之间的交际有关。在该过程中，身份认同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认同的多样性和我们如何感知身份认同，会在第五章作详细的介绍。

本书作者考虑到了各个层次，并在第二章结尾处将这三个层次融为一个模型，两位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理论的、涵盖面极广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该模型展示了两个个体之间交际过程的多个层面，这些层面既复杂又相互联系。

与陌生人进行交际时，预测陌生人的反应会有一些的难度，因而交际的不确定性会更高。我们不确定陌生人的态度、感受和信仰，也没有把握去解释陌生人的行为。如果我们期望与该陌生人深入交往，或者这些交往会带来潜在利益，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动机会更加强烈。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在不确定性的上限和下限之间运作。如果阈限过高，我们的焦虑感会妨碍我们的有效交际能力；阈限过低，我们又容易忽视应注意到的差别。在交往过程中，我们会逐渐设法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我们可以通过获取更多有关陌生人的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提高我们预测的准确性。本书作者提出了三种获取此类信息的方法，即通过被动地观察陌生人，从该陌生人的朋友或书本中获取信息，还可以直接通过与陌生人交流并提问来获取信息。同时，一方提供有关本人的信息通常会促使另一方相应地报之以自己的信息。

当我们预见到一系列更多的消极后果时，与陌生人交往的不确定性变得强烈，随之而来的是高度的焦虑感。我们可能会担心因困惑和失控而挫败了自信心；可能会因无能为力或可能被人利用而心存不安。我们可能担心不能给陌生人留下积极的印象；也可能惧怕与陌生人交往会导致内群体成员的非议。一般说来，通过有意识地加强交际过程的注意力，获取更多的有关该陌生人的信息，这些焦虑感是可以消除的。两位作者又特别强调，个体倾向于根据情境来解释自身的行为，并倾向于把别人的行为归因为该个体的性格因素。与陌生人交往时，我们极有可能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为其性格所为，然后将他们的性格看作是其文化（或种族等）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我们极有可能依据我们已有的“那种人是什么样子”的刻板印象来解释陌生人的行为。

两位作者提出了“留心”(mindfulness)这一概念以指导这些学习的过程。“留心”(mindfulness)这个概念是基于 Ellen Langer 的研究成果，意指要培养一种敏锐的意识，辨识异同。这个概念也是 Gudykunst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关键部分（见 43 页）。这个模型在本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本章最后，两位作者解释了这个纲要，为接下来的内容做好了铺垫。

第二部分 与陌生人交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在介绍了“交际”、“文化”和“陌生人”等几个核心概念后，两位作者接下来探讨特别关键的交际“情境”。作者过程式的探究方法非常值得称道。因为语言及语言学的培训大多都集中在“交际事件”，这些事件纵然内容丰富，在没有了解它们发生的

具体情境下,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在同与我们的文化背景相异(即使差别甚微)的人交际时,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幕后”起作用的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交际双方。

交际背景繁冗复杂,Gudykunst 和 Kim 很明智地专门用四个章节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虽然他们把这些影响因素区分为“文化的”、“社会文化的”、“心理文化的”和“环境的”几大类,作者还是很明确地强调这些因素应该集结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他们指出,了解情境的多种变化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预见、预测、应对和评价与背景不同的对方(陌生人)所进行的动态交际。

第三章 文化对交际过程的影响

对跨文化交际的学生来说,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所有介绍文化差异的深度和广度的书中结构最完善的一章。我们对文化和交际的理解大多是建立在我们对价值和文化差异的的分类的基础上的。

首先,两位作者将 Kenneth Pike (1951)对语音和音素的区分应用到文化研究中,其中既有全世界普遍性的(客位)原则,在各文化中又有地方性(主位)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很有必要了解某一文化形态的(主位)特殊性,同时又将该文化和普遍理论框架进行比较对照。作者基于系统的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可以增强我们对文化的洞察力,从而使我们能对一些文化行为做出预测。

很多其他的文章对 Parsons (1951)、Kluckhohn 和 Stodtbeck (1965)、Rokeach (1971)、Hofstede (1980)和 Schwartz (1982)所作的奠基性的价值研究都有所介绍。但 Gudykunst 和 Kim 的优点在于他们采用了主题法,从文化差异领域中最显著、研究最深入的方面开始,配合广泛的辅助研究,来说明这些维度如何在文化和个人层次上起作用。这一章非常详实地回顾了一些典型的关于各个维度的心理和外部运作的研究。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尺度是研究最多、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领域。与其他著作相比,本书更进一筹。两位作者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如何受深层次人格(Triandis 的他者中心主义(allocentrism)和自我中心主义(ideocentrism))、个人价值观(有效地融合了 Schwartz 的理论)和自我构建(建立在 Markus 和 Kitayama 的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概念之上)的影响。本章理论涵盖广泛,论证了来自不同文化和个人背景的人如何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其文化行为。

围绕每个主题,作者非常谨慎地为广泛的个人差异留有余地,这也更确切地反映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交往的人的复杂性。通过这种方式,本书不仅介绍了每个经典价值取向框架,而且融合了影响不同民族的社会和心理因素,提出这些因素如何指导交际者的行为。本章完整地回顾了一些关键概念、它们的相互关系及相关的研究,使跨文化交际学的学习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在完整地探讨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之后,作者把 Hall 的经典高语境(HC)和低语境(LC)作为一个次级条目作了介绍。这实际上帮助阐明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在直接性或其他多种交际行为上的差异。本书作者又引入 Grice 若交际准则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应用,拓宽了我们对高语境和低语境的认识。本章的另一特色在于它试图找到各维度在文化和个人层次上的关联性,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有人可能认为有必要深入考虑文化的中间层次(亚文化亲密群体),对此下一章将有所涉及。他们还

指出,虽然文化层次(也作民族层次)的维度已经分离出来(主要是 Hofstede 所做的研究工作),但大多数在个人层次上没有被证实。紧接着,作者对不确定性的规避、权力距离和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做了非常确切的总结并加以延伸(附有表格)。

他们就 Kluckhohn、Strodtbeck 的价值取向理论的讨论与其他相关著作大同小异,都未能注意到原先的社会关系取向在 Hofstede 的研究中被一分为二。还有待商榷的是, Kluckhohn 的“取向”究竟是不是价值观,是不是可以将其列为信仰取向,因而可能跟 Leung 和 Bond 的社会公理(Social Axioms)联系更加密切。

很多著作只是简要提及 Parson 铜模式变量的先驱性价值研究,但是 Gudykunst 和 Kim 十分有效地解释了这五个互斥的领域。这种解释是很重要的,因为近期 Peng Kaiping、Kitayama 以及其他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疑问,对亚洲人或那些在象形文字(像汉字)环境下长大的人,是否任何选择都是互斥的。那些有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持有中和(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或者在各领域保持中间平衡。同时,本章也介绍了 Triandis 的紧密结构或松散结构文化概念。不过,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均需作更为谨慎的评价。

本章结尾介绍了 Philipsen 的“言语代码理论”以及文化成员如何通过文化交际来建构他们的仪式、神话和社会剧本(social drama)。这反映出美国主要通过言语和修辞来研究交际学,相反,中国则更多地通过语言教育和文学。这些主位的方法都重要,但是 Gudykunst 和 Kim 表示,将这些方法与更广泛普遍的客位维度相联系,是很有价值的。

第四章 社会文化对交际过程的影响

价值观研究和身份研究由来已久,方法多样,在任何一本跨文化教程里,两者都是最难描述、最难分类、最难调查的研究领域。在前三章,本书作者对价值观及相关的文化变量作了精彩的介绍,本章则开始探讨身份认同问题。

作者从功能性或层次性的角度来看待身份的多样性。首先,作者探讨了一个相对宽泛的主题:我们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然后又转向各种社会构建的身份,最后阐述了参与者所扮演的更加个人化的角色问题,尤其是角色身份如何影响我们和陌生人的交往。和前一章一样,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维度是本章分析和组织的焦点。这一维度实用性强,被广为运用,但是有许多学者,尤其是受 Edward Said 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的文化研究学者或者研究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学者,认为权力影响着我们对种族、族群、性别和其他文化建构标签的概念,因而更加重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别的确对身份认同有诸多影响。权力距离和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维度可以更多地加以应用,跟与权力相关的广泛研究结合起来。

作为传播学者,本书作者基本上遵循 Tajfel 和 Triandis 的理论传统来看待社会范畴化、内外团体和自我观念对构建社会身份的影响。通过引用许多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作者向我们表明任何文化都构建一种基于激活—未激活(activated-inactivated),自愿—非自愿(voluntary-involuntary),欲求—非欲求(desirable-undesirable)和主观—客观(subjective-objective)的社会身份体系,而且这些身份会影响个人的个体自尊或群体的集体自尊。由此,作者介绍了文化中存在的有关社会身份的变量,尤其是国家、

民族、性别、残疾、年龄、社会阶级和角色等身份。这一系列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可能影响我们与陌生人的交往的身份的多个层次。

由于美国移民的文化多元性,本章很多篇幅都在讨论族群身份,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和“种族”身份的区别。为了更加清楚地阐明民族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冲突,作者运用了身份认同的强弱和内容这一模型来帮助读者理解强身份认同和弱身份认同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见111页)。这一部分使我们对“美国意识”有了更精确的理解。它解构了“典型美国人”的“大熔炉”概念,有助于那些没有在美国种族/族群政治和歧视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人们对自己的肤色和民族背景应如何被感知或对待,在态度接受度和喜好上有着很大的差异。Gudykunst和Kim很明智地指出,在美国大多数的欧裔白人并不清楚各少数群体中存在的问题,不了解他们的观点或情绪,两位作者想尝试缩小两者间的认知差距。在中国,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可能同样缺乏对少数民族身份问题的认识。如何在中国国家内部加强交流和统一,对此我们还要作更多的思考。

本章的另一贡献是它为我们罗列了关于交际中身份协商的三大交际学理论,包括Cupach & Imahori的身份管理理论(IMT)、Ting-Toomey的身份协商理论(INT)和Orbe的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IMT以关系交际能力为理论基础,INT表明由于交际者的多重角色,每次人际交往都具有独特性,而共文化理论则是从上面提到的权力体系的研究发展而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2005年出版的Gudykunst的闭门之作《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三个身份理论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样,2005出版的林大津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和实践》对此有精彩的中文概述。尽管都称为理论,事实上每一个理论都为我们理解交际者的身份概念如何影响其在真实情境中与陌生人的交往提供了一种视角,有助于读者考虑自己的切身交往并选择最适宜的交际方式。

本章的遗憾之处在于没有涉及到文化的历时变化,或者说,本章没有从代际的角度来看待身份的变化。定义一代人的变化如何影响话语结构(如Niel Postman在《娱乐致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或Scollon & Scollon在《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法》(*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癡A Discourse Approach*)中所论述的),大多数的跨文化交际学和心理学学者倾向于把文化看成抽象的单一维度的东西,本书作者也不例外,从而忽略了次文化群体或非参与性个体成员的多样性。科技的进步或者划时代的事件(灾难或成功)也会引起文化的变化,这些方面有待于更多的研究。不过,总体而言,本章为未来的此类或其他身份现象研究和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章 心理文化对交际过程影响

有人批判说,跨文化研究好像仅限于解释行为方式和认知的概念,却忽略了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伍晓慧曾提出要多注意研究情感维度。作为为数不多的教材编写者之一,Gudykunst和Kim在本章中对以往的研究方法作了很好的完善,对心理文化的影响做了很好的介绍。

伍晓慧进一步指出,当教材讨论涉及到情感领域时,只是将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和偏见这几个主题堆砌在短短的篇幅内,而Gudykunst和Kim则更为详细地介